

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

French Jesuits and Diplomatic Affairs under the Kangxi
Re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李晨哲
Li Chenzhe

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

French Jesuits and Diplomatic Affairs under the Kangxi Re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李晨哲

Li Chenzhe

内容提要：

将清史研究放入全球史研究的框架中是近些年清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康熙朝时期，耶稣会传教士行走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带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其背后也代表各国的国家利益。本文以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为切入点，通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国王的数学家”、中俄谈判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教宗特使铎罗来华与“礼仪之争”三个事件研究法国传教士在当中的影响。从相关中外文献出发，以全球史研究的方法解读康熙朝中外关系以及互动视角下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对比17—18世纪的欧洲，分析清初中国政府对外交流的特点。

关键词：

法国传教士 康熙朝 “国王的数学家” 《尼布楚条约》 “礼仪之争”

ABSTRACT:

One of the major approaches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study in recent years is to put i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history studies.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1662-1722), the Jesuits traveled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nds of Eurasia. While they fostere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y also represented national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oles that French Jesuits have played, in the three diplomatic incidents of the Qing Empire under the reign of Kangxi, namely the dispatch of “King’s Mathematicians” by Louis XIV of France, the Sino-Russian negotiations, leading to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and the arrival of Tournon in Beijing to settle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Based on Chinese and French historical sourc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from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with the approach of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by comparing the activit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17th -18th century.

KEYWORDS:

French Jesuits, Kangxi reign, “King’s Mathematicians”, Treaty of Nerchinsk,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 本文得到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和万科公益基金会专项经费资助。

由于众多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康熙朝是明清中外交流比较频繁的时期。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侧重清代西洋人眼中的中国和此时期不对称的中西文化交流¹;第二,关于双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相关文物的研究²;第三,以康熙帝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如何开创性地任用西士服务于朝廷和宫中³;第四,清初对外沟通的特点与方式⁴。总体来讲,先行成果的研究是单一视角的,并且以清代统治阶层的视角为主。

清代历史研究相比于前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含更丰富的中外关系研究。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因此需要用世界的眼光看清史,将清史研究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中去探讨。本论文利用国内研究较少关注的《张诚神父未发表的五封信》及菲利普·阿弗瑞尔(Philippe Avril)的《旨在发现通往中国新道路的欧亚多国之旅》,希望以全球史研究的方法解读康熙朝中外关系,以法国耶稣会士为切入点,通过探讨他们所联结的17—18世纪的中法关系、中俄关系、中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分析互动视角下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从不同角度探讨清初中西交流的特点。

一 中法交流的使者——“国王的数学家”

在法国之前,荷兰、葡萄牙已经向清廷派遣使节。为了能在欧洲诸国海外扩张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于17世纪末也积极加强与中国的沟通,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连接两国君主的交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了两次“国王的数学家”。第一批于1688年抵达北京,共六位,他们从法国布雷斯特离港,分别是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ion)、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李明(Louis Le Comte)、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和塔夏尔(Tachard),其中塔夏尔中途留在暹罗,未能抵达中国。第二批“国王的数学家”由白晋领队,乘坐法国商船“安菲特力特”号,于1698年抵达中国。“国王的数学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使团,为了不与在远东拥有“保教权”的葡萄牙发生直接冲突,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以“数学家”的名号出访。“安菲特力特”号不是皇家御船,避免了法国国王向中国派遣官船的消极影响。尽管如此,法国耶稣会士有多位,如张诚、白晋、巴多明等留在清廷为康熙帝服务,成为17—18世纪中法官方沟通的代表人物。

(一) “国王的数学家”派遣的宗教背景:打破葡萄牙“保教权”

在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式向中国派出耶稣会传教士之前,由于葡萄牙王国在远东享有保教权(padroado)⁵,中国国内的耶稣会传教活动主要由葡萄牙王国垄断。在1698年第二批“国王的数学家”大举入

1 参见欧阳哲生:《盛世下的忧患——中西关系视角下的康熙盛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1卷第5期,《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等文章。

2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的郭福祥老师和关雪玲老师,前者侧重对西洋传教士带来的钟表的研究,后者在宫廷西洋药物和清代中西医学交流方面颇有成果。

3 参见冯尔康:《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该文全面地总结了康熙时期西洋传教士参与的清宫活动,把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归化为清史研究的重要部分。

4 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314—474页。

5 保教权是由罗马教廷授予的由世俗政权承担的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是天主教传教事业上的优惠特权。

华之前，葡萄牙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葡萄牙语甚至是中国教区的“官方语言”¹。17世纪末法国王室向中国派遣传教团的行为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事件，其背后还有相应的政治意义和经济利益。法王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法国国力蒸蒸日上，逐渐代替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欧洲大陆上最为强盛统一的国家。他不希望属于自己臣民的传教士受葡式传教体系的控制，借助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有助于法国在东方的势力扩张，打破葡萄牙在东亚对教务的垄断²。而以传教名义的扩张不仅有政治影响，还有经济利益。时任财政大臣柯尔贝³希望在葡萄牙国势渐微之际，抓住时机积极发展法国与远东国家的贸易关系。“国王的数学家”所代表的传教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700年11月30日张诚成为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的第一任总会长，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自此与葡萄牙耶稣会的中国副省相分离。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团体逐渐脱离葡萄牙管控，成为受法国政府保护的独立传教力量。路易十四的派遣行为反映了法国自身的政治利益、宗教利益和经济利益。同为耶稣会的法、葡两国传教士之间的斗争代表了国家力量的角力。

（二）法国君主的使命：传教士的科研活动

“国王的数学家”的到来促使越来越多的法籍教士以法国国王使者这一身份出现，耶稣会士不仅是宗教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中、法两国交流的桥梁。一方面，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肩负着为法国国王和皇家科学院做科学研究和地理探索的使命；另一方面，法国传教士在中国皇宫为皇帝、皇子们授课，传播西方科学知识。

虽然宗教、教会相关人士不能成为皇家科学院会员，但科学院可以派遣传教士去亚洲、美洲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和地理探测，为皇家科学院收集重要的科学数据、地理信息。洪若翰神父于1703年2月15日写给拉雪兹神父（Père la Chaise）的信件证实了这一点：

如您所能想起的那样，正是在1684年岁末，上帝赐予了派遣法国传教士到中国去的机会。当时在法国，人们正根据国王的诏令，为改造地理学而工作。皇家科学院的先生们奉命负责此事，他们派遣了其团体中最精明能干的人赴大西洋和地中海各港口，英国、丹麦、非洲和美洲诸岛屿，在那里从事必要的考察。大家对遴选将被派往印度和中国的人员感到最为棘手，因为这些地区在法国较少被人所知，且科学院的先生们还认为，在那里可能会有不受欢迎以及使执行计划的外国人感到不安的危险。由此，人们把目光转向了耶稣会士们，后者在整个这一地区拥有传道团，他们的天职就是前往他们认为在拯救灵魂方面能取得最多成果的任何地方。⁴

皇家科学院选择耶稣会教士是因为后者有无可替代的优势：首先在远东，耶稣会已经拥有较大的传教范

1 耿晨：《中法文化交流史》，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13年，第102页。

2 李晟文：《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第53—54页。

3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年8月29日—1683年9月6日）是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他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也是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4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1卷，大象出版社，第251页。

围,天主教传播成果初显,传教士甘愿为传播福音远行。其次,耶稣会士受过严格教育,具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素养,这是天主教其他修会无法企及的优势。耶稣会学校的科学教育,特别是数学相关的课程在旧制度时期颇具名望。当时的耶稣会学校除了日常的神学培养,还设有诸多科学讲堂。数学课程内容丰富,除了教授纯数学,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分析法,还教授应用数学和与数学相关的交叉学科,例如:天文学、光学、透视学、力学、水利学、应用几何学(土地测量、地形测绘),甚至还学习防御工事修建技术和音乐。耶稣会学校在法国的多座城市设有类似讲堂,如阿维尼翁、里昂、图卢兹、巴黎、兰斯等城市¹。洪若翰当时在巴黎的耶稣会克莱芒学院教授高等数学,已经出版多部著作,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法籍耶稣会数学家;张诚在科学研究方面颇有成就,擅长天文学,出发前曾在法国香槟省教授数学;刘应神父醉心并且十分擅长天文学²。

“国王的数学家”随同路易十四派往暹罗的使团一同出行,出发前同巴黎天文台首任台长卡西尼进行了多次会谈,为远行做准备。法国皇家科学院遵照国王的命令为耶稣会士配备了一套完善的科学仪器、法国皇官铜版画、精美装帧的图书等礼品³。这些礼物不仅有助于传教士自己的科学观察和研究,也有助于在中国宫廷传播先进的科学知识。

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其实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全球性科学考察活动的一部分,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的科学改革。中国方面,康熙皇帝对西洋的天文历法、先进的科学知识和仪器充满渴求,希望有更多的西洋科学家和工匠为自己效力,巩固自己的威信和统治。两者的目的和追求的利益虽然不同,但都在促进中西方科技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17—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三) 中国皇帝的使命: 出使法国

“国王的数学家”不仅是法国君主的使者,也是中国君主的使者,其中白晋、洪若翰两位耶稣会士都奉康熙之旨回访法国。白晋的出访直接连接了中、法两位君主。

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1693—1698),白晋(Joachim Bouvet)返回法国,将所著《康熙皇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Chine, présenté au Roy*)呈于路易十四,向法王转述康熙帝招募人才的意向及白晋本人希望加派传教士的请求。路易十四也认为这是扩大法国在中国影响的好机会,支持白晋招募人员,并给他一万法郎购置赠予康熙帝的礼物。

白晋的返欧之旅促进了中法宫廷之间的直接交流。一方面,白晋从法国带来了更多的耶稣会士,包括许多科学人才,如雷孝思、巴多明、马若瑟,他们留在清宫为皇帝服务,对于清帝来讲,这是一次来自欧洲的人才引进。另一方面,白晋所著献给法王的《康熙皇帝传》、献给勃艮第公爵夫妇的《图解中国现状》(*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 dédié à Monsieur le Duc et à Madame la Duchesse de Bourgogne, 1697*)二书引发了法国王室和贵族对中国的关注,带动了欧洲的中国热。

1 François de Dainville, *L'Éducation des jésuites (XVIIe-XVIIIe siècles)*, Paris: éd. Minuit, 1978, p. 323.

2 Bernard Brizay, *La France en Chine*, Paris: Perrin, 2013, p. 31.

3 [法]伊夫斯·德·托马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辛岩译:《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页。

法国传教士积极地连接中法宫廷交流。张诚在信中写道：“中法两国的贸易会变得常态化，在巴黎会有人专门负责我们（法国耶稣会士）的事务，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一切必需的物品。”¹他还曾期待两国君主有更长远的对话：“如果皇上和我们的国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通信，就像一开始的那样，皇上有可能亲自安排我去法国。”²不过，由于一直忙于在康熙的宫廷中服务，张诚生前未能返回故土。

虽然法国耶稣会士不是法国政府官方的外交使团，但他们在连接中法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多重作用。作为教会人士，他们承担了在东亚开拓法国传教版图的任务；作为科学家，他们需要给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供中国地区的科考成果；作为使臣，他们往返于中、法两国宫廷，是康熙与路易十四沟通的桥梁。

二 中俄谈判——中方谈判团的翻译

研究法国传教士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的作用，不能忽视传教士自身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和修会利益。传统的清史研究往往缺少这一史实考证的全球史视角。在中俄谈判相近的时间节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试图通过俄罗斯打通中法之间的陆路传教通道。这一事件对耶稣会士在谈判中的表现和立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康熙派遣谈判团的历史背景

16—17世纪，作为纯粹欧洲国家的沙俄帝国开始向东扩张。随着其对西伯利亚地区扩张的深入，中国东北地区日益受到威胁，在俄方占领了中方领土之后，双方冲突加剧。清政府于1684年、1685年和1686年三次进攻雅克萨，发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沙俄入侵军。沙俄最终同意举行和谈，和平解决中俄边界问题。俄国大使戈洛文于1687年到达色楞格河，准备和清帝国进行谈判。中方于1688年5月30日首次派出以索额图为首的谈判使团。临行前，康熙对谈判涉及的领土给了使团明确的旨意：

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儿等三佐领，又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³

由于使臣索额图等不懂外文，而俄方代表不懂汉语和满语，所以拉丁语成为谈判语言，而耶稣会士具有精通拉丁语这一优势，“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实而诚恣可信，罗刹⁴着徐日昇去，会拉提诺文字⁵，其文妥当，汝

1 Henri Cordier, "Cinq lettres inédites du Père Gerbillon, S. J., Missionnaire français à Péking (XVIIe et XVIIIe siècle), publiées par M. Henri Cordier", *Extrait du T'oung-pao*, Série II, Vol. VII, N° 4, Leide: E. J. Brill, 1906, p. 464.

2 *Ibid.*, p. 463.

3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

4 俄罗斯东部。

5 Latino 的音译，指拉丁语。

等也行移文，往说罗刹”。¹康熙派遣了宫中两名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昇和法国人张诚参与中俄和谈，由他们担当谈判中的翻译。菲利普·阿弗瑞尔²的《旨在发现通往中国新道路的欧亚多国之旅》³也记载了该事件，但由于信息偏差，他将两位耶稣会士都记录成法国人。

由于从莫斯科到边境地区路途遥远，俄国人无法派遣人数众多的军队维持这场战争，而这一地区临近中国，满蒙族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沙皇认为促成和谈比用兵打仗对自己更有利，后者会让自己的军队遭受各种风险。中国人接受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派遣了一名大使前往长城以外很远的地方，甚至还随行派遣了两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正是六年前我们虔诚的基督教陛下派往中国的成员，他们是此次谈判的翻译。为此，已经告知俄方派遣一名懂拉丁语的代表，但我们不知道这次谈判能否成功。⁴

康熙帝先选中徐日昇，徐日昇又选定张诚随行⁵，由于这一时期的清宫传教士还是由葡萄牙主导，因此张诚是居于第二的人物。在出发与俄方谈判前，康熙帝赐予两位传教士很高的礼遇：“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徐日昇、张诚奉召趋朝，赐蟒袍一件，大缎四匹。四月二十八日，赐蟒素鞍衬各二副。五月初一日，上遣赵侍卫捧团龙米色御服貂皮外衣各二袭，至徐日昇、张诚馆舍，传旨赐予。”⁶欧洲的文献记载在赏赐物品上略有出入：“康熙皇帝召见了徐日昇和张诚，赐给他们每人一件绣有巨大金龙的丝绸黄马褂，后来又赐给他们两副上面绣有金龙的丝绸悬垂布垫的马鞍，以及两件金丝制的、有裘皮衬里的袍子。”⁷

《徐日昇日记》记载：“皇帝就是这样赏赐给我们各种恩典。既然他已将一切公之于世，我在此只需要提一件事：他向钦差大臣之一，他的舅舅提出，要他招待我们一起吃住，要像尊敬皇帝本人一样尊重我们。”⁸张诚也在日记中写到皇上派皇长子为谈判的使团送行，并且举办了盛大的出行仪式⁹。

1688年中方的第一次出行因为在北部遇到了噶尔丹的叛乱而被迫返程。《清实录》记载：“是日，索额图等起行，寻以喀尔喀、厄鲁特交相征战报至。”¹⁰根据《徐日昇日记》，中方谈判使团在离俄国使臣议和的

1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344页。

2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受路易十四派遣，同法国传教士薄贤士一道试图建立中法陆路传教通道。

3 书名为作者根据法语原文自译。

4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entrepris pour découvrir un nouveau chemin à la Chine*, Paris: Claude Barbin, 1692, p. 198. 笔者自译。

5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合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年）》（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036页。来自《徐日昇日记》，根据俄译并参照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的《耶稣会士徐日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6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345页。

7 圣伯多禄的冈萨雷斯：《中国新教难简述》，出版社不详，1712年，第170页。引自：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15页。冯尔康先生在《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探析》中认为这是传教士的误读，因为黄马褂非大的军功不可得，所以赏物应该是蟒袍。

8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年）》（第二卷），《徐日昇日记》，第1037页。

9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d'après les mémoires des pères Martin Martini, Ferdinand du Verbiest, Philippe Couplet. etc.] enrichie de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ressées par le sieur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uville géographe du roi] et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et de vignettes*, Paris: G. Le Mercier, 1735, vol. 4, p. 89.

10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

地点——色楞格斯克仅剩几天路程的地方，他们得到了厄鲁特人已侵入喀尔喀领地的消息¹。

中国的谈判使团于1689年6月13日再次出发，这次谈判的地点选在尼布楚，两位传教士依然随行。临行前，清朝政府对当时的形势和谈判方针重新做了研究。由于噶尔丹叛乱已经发生，且叛匪极有可能与入侵的俄国结盟，清政府更加迫切地要求与俄国实现和平，从而可以集中全力对付叛军，以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康熙意识到形势已有不利变化，谈判方针需要做相应调整：“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託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²

（二）耶稣会士的作用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并不顺利，谈判过程非常艰苦，几次陷入僵局。沙俄领土扩张的目的非常明显，而中方的钦差大臣也有康熙帝吩咐的底线，不能让步。关于传教士在条约签订中的作用，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张诚在中俄和谈中起到调停作用。但也有观点认为张诚与徐日昇曾私下与俄国谈判大使戈洛文沟通，收受贿赂，在中俄谈判中为俄方探听中方代表团的谈判底牌。

耶稣会教士留下的日记和信件都对两位传教士在谈判中的积极作用极尽夸奖，认为传教士在代表团中的角色早已超出单纯翻译的范畴。二人通过在中俄代表之间的斡旋调和，避免和谈走向失败，功劳显著。

徐日昇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中俄双方谈判中出现的每一次博弈和僵局，并且强调自己的功劳：自己始终没有丧失谈判可以圆满结束的希望，曾多次排除困难，消除中国钦差大臣对俄国使者的疑虑，敦促俄国使臣做出决议，从而挽救了可能破裂的谈判。³

张诚的作用在法国传教士的书信中有所体现。洪若翰神父在给拉雪兹神父的信中（1703）写道：

在某些重要的场合，传教士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颇为有用的。张诚神父尤其懂得利用这一点。由于他来自法国，那里，人们经常谈论君主的利益，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和约使人们千百遍的思考其后果对民族是利还是弊。⁴

张诚根据双方的态势和需求判断出中方更迫切地需要和俄国人签订和约，保证其不与叛乱的噶尔丹相勾结，俄方希望获得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到北京自由贸易。

张诚奔走于中俄代表团之间，传递信息，提出谈判建议，缓和气氛。他把会激怒双方的东西隐藏起来。最后，他巧妙地照顾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人和俄国人都对此感到满意，使和约得以顺利缔结。⁵

1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年）》（第二卷），《徐日昇日记》，第1037页。

2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康熙二十八年夏四月壬辰。

3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年）》（第二卷），《徐日昇日记》，第1037页。

4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1卷，第278—279页。

5 Louis Le Comte,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ère édition, 1696, édition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2013, p.385-386.

俄方在获得每年可到北京自由贸易这一好处之后答应让出雅克萨城，而收回雅克萨也是康熙帝给中方钦差大臣们设立的前提条件。有学者认为，这次谈判徐日昇参与度更高，而张诚的作用并非像法国教士所赞扬的那么重要¹。

史学界另一种观点认为传教士在谈判中为自己获取私利。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所著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对两位传教士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虽然该著作的史学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彼时历史环境和政治观点的影响，但为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角度。中方代表团之所以在谈判中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正是因为徐日昇和张诚向俄方透露了康熙皇帝的底线，使得中国谈判团过早地露出底牌，让俄国人把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耶稣会士与沙俄的利益交换甚至可以追至另一位有名的传教士南怀仁。早在徐日昇和张诚随团出使之前，南怀仁已经与俄方有书信相通：1676年俄国使团尼果赖出使北京，其中有一位随员文纽科夫收到一封南怀仁的秘密信件，信中建议俄国方面应该坚持用拉丁文作为谈判的中介译语，这样清廷就不得不依靠传教士做译员²。耶稣会士可以借此机会在两个大国之间周旋，从中为耶稣会的传教事业谋利。谈判过程中，俄方在雅克萨的归属问题上反复无常，但是耶稣会教士却并没有完全捍卫中方利益，徐日昇建议中方不要再抱怨俄国人，放弃谈论以往的越境背约事件，他坚持双方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尽早建立共同的边界³。

（三）中俄谈判与中法陆路交通

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和张诚都希望和沙俄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既可以保障在俄耶稣会士的利益，又希望打通经过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前往中国的传教道路。特别是相比海难频出的海上交通线，陆路更安全，如果贯通，将是一条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捷径。

打通中欧陆路传教线路的计划最早是由著名耶稣会士南怀仁提出的。17世纪中期，康熙帝执政初年，时任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就有经俄罗斯建立中法陆路传教线的想法，希望开辟一条从巴黎到北京持续的陆路通道。1687年10月，南怀仁向法国耶稣会的拉雪兹神父写信重申通过俄罗斯陆路派遣传教士来华的必要性⁴，尤其强调清宫皇帝和皇子对西方天文学、数学的极大兴趣，希望法国能派遣更多擅长科技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法之间的陆路传教交通线一旦建立，耶稣会的传教范围将不局限于中国地区，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也将成为传教对象。

在南怀仁的建议下，路易十四于1687年开始多次派遣耶稣会传教士试图打通过俄罗斯到达中国的陆路

1 帕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Chinese Russian Relations*），纽约，1949。引自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12页。

2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6页。所参考的文献：巴特莱：《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436页。

3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86—1691年）》（第二卷），第1056页。

4 参见 Arthur Beylerian, « Deux lettres de Louis XIV au roi des Ouwbeks à propos de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 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vol. 9, no2, 4-6, 1968, p. 230;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entrepris pour découvrir un nouveau chemin à la Chine*, Paris, Claude Barbin, 1692, préface.

传教通道。菲利普·阿弗瑞尔在《旨在发现通往中国新道路的欧亚多国之旅》中记录了清初法国传教士探索中法陆路交通路线的过程。阿弗瑞尔向沙俄政府致信，希望能够获得穿越鞑靼地区、西伯利亚地区的许可，开辟向中国传教的陆路通道，但沙俄没有同意。他改变策略，向驻波斯王国的西里伯爵（comte de Syri）请求帮助，写信希望他能协助耶稣会教士穿越俄国到达中国。

1688年9月初，西里伯爵携带路易十四的信件从华沙出发前往莫斯科。由于沙俄政府对于法国传教士穿过俄国前往中国一事的态度并不明朗，传教士使团做了备用方案，即取道土耳其、波斯和鞑靼地区抵达中国。传教士使团兵分两路，阿弗瑞尔神父和薄贤士神父出发前往莫斯科，另一队耶稣会士前往土耳其和波斯¹。如果俄国予以通行西伯利亚的许可，则传教士们在莫斯科会合出发；如果无法获得通行许可，则取道波斯北部和乌兹别克地区抵达中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法国传教士的张诚在谈判中一定会努力维持与俄国政府的关系，在调停的过程中尽量同时确保俄国的利益，换取他们对中法陆路传教线路的支持。然而事与愿违，即使沙俄在形式上感谢了两位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昇被聘为莫斯科科学院的通讯院士”²，但还是于1689年下令关闭耶稣会士在莫斯科的会院，禁止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通过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传教³。俄国政府不仅勒令西里伯爵即刻返回波斯，还禁止法国传教士同行，也不能取道波斯、绕行乌兹别克前往中国，1689年2月，耶稣会士只能借道摩尔多瓦离开⁴。

对比张诚和徐日昇的日记以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发现两者虽同为使团翻译，但地位不同，张诚是徐日昇的副手，葡萄牙传教士在清宫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新来的法国数学家的话语权比不上前者。他们出使的目的和立场也有微妙差异。徐日昇的日志是他向耶稣会上级的汇报成果，内容基本围绕中俄谈判展开，涉及了诸多谈判细节。日记原文一直留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作为耶稣会内部信件保存下来，没有公之于世。相反，《张诚日记》俨然是一部详细的科学考察记录和旅行日志。张诚受命于法王路易十四进行天文、地理观测，在日志中标出所经过的所有地点及经纬度，相关内容发表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张诚在谈判中积极斡旋，希望推动沙俄政府同意保障中法陆路交通顺畅。

即便在中俄双方谈判使团看来，两位教士没有差异，但他们其实各自代表葡、法两国利益，彼此之间也有无法忽视的矛盾。“徐日昇最严格地代表葡萄牙保教权的利益，而张诚则是一个侵入其势力范围的法国人。”⁵张诚在给拉雪兹神父的信中表达对徐日昇的种种不满，谈到葡萄牙人为他们设置的种种障碍，认为他“以极其恶毒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法国人”⁶。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关系，其中涉及17世纪的中俄关系、中国宫廷与传教士的关系、传教士之间所代表的法葡关系、俄国与天主教大国法国和传教团体耶稣会之间的关系，可以从

1 Jacques Villotte, *Voyage d'un missionna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Turquie, en Perse, en Arménie, en Arabie et en Barbarie*, Paris, 1730, p. 3-4.

2 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21页。

3 Philippe Avril, *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entrepris pour découvrir un nouveau chemin à la Chine*, p. 219-220.

4 Arthur Beylerian, « Deux lettres de Louis XIV au roi des Ouwbeks », *op. cit.*, p. 233.

5 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13页。

6 同上，第24页。

中一窥17世纪各国力量的角逐和国家利益的博弈。两位耶稣会士具有谈判意识，对国际法和国家法比当时的中国和俄国使团有更好的了解，在谈判中起到了缓和与调解的作用，但决定和谈走向和条约签订的还是两个大国的力量博弈与事态发展的进程。中方对和谈比较迫切的原因是担心噶尔丹与沙俄的联合，俄方无法在领土扩张上进一步实现自己野心的原因是当地人民的反抗和康熙帝给使团下达的谈判底线。张诚和徐日昇在谈判中积极调停，一方面向康熙帝显示自己的能力和忠诚，另一方面向沙俄示好以保障耶稣会的传教利益，希望通过沙俄建立抵达中国的陆路传教线路。但是，清帝国此时的军事和政治实力、法兰西王国在西欧的强盛和扩张成为沙俄放行法国传教士东去的主要顾虑，中法的陆路传教通道并没有打通。

三 中梵关系——“礼仪之争”斡旋失败

（一）中国宫廷的修会之争

“礼仪之争”的讨论一直伴随着耶稣会的在华传教活动。耶稣会在华奉行的“利玛窦规矩”一直被其他更为保守的天主教修会和组织所抨击。所谓“礼仪之争”，主要是讨论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可以参加传统的“祭孔、祭祖和祭天”的礼仪活动而不被天主教会教义认为是在参与异教徒活动。天主教认定的“中国礼仪”这一措辞包含了中国本地三种特定情况，其中无一涉及弥撒或天主教堂举行圣礼这样的礼拜仪式。第一种是所有中国士人定期在孔庙举行祭孔仪式；第二种是祭祖问题，即一名中国的教徒是否能够继续在祖先的灵位或坟墓前进行焚香、上供、跪拜等人们普遍从事的活动。这两种习惯性做法构成了人们执行的“礼仪”。在此之上还有第三个问题，即“术语问题”。中文典籍中所用的“天”和“上帝”这类术语是否能直接指代基督宗教概念中的“神”的概念？反对“中国礼仪”是可以保障教会教义的完好无损，但这种传教方式是在西方思维模式下的行事方式¹。它在面对中华文明这个演变和发展了上千年的文明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群体时就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和矛盾。

“礼仪之争”不仅是中西信仰、文化的冲突，也是天主教内部斗争在中国宫廷的体现。首先，组织严密的耶稣会在传教影响力上与罗马传信部形成抗衡，两者间一直存在矛盾²；其次，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奉行的是更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尊重中国文化和礼仪，称之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认为学者的祭孔行为应当被当作学术活动而非宗教活动，祭祖行为也不构成迷信活动。此举遭到其他修会或传教组织的反对，例如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礼仪问题提交到罗马。“礼仪之争”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不仅在罗马，甚至在整个欧洲都是热门话题。时任教皇克莱蒙十一世为了平息各个修会派别和不同传教士之间的争执，决定派遣教宗特使铎罗前往中国。

¹ 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18—119页。

² 参见：Giovanni Pizzorusso, “Le pape rouge et le pape noir. Aux origines des conflits entre la congrégation « de Propaganda Fide » et la Compagnie de Jésus au XVIIIe siècle” in Pierre-Antoine Fabre et Catherine Maire (dir.), *Les antijésuites : discours, figures et lieux de l'anti-jésuitisme à l'époque moderne*, Rennes, PUR, 2010, p.539-561.

（二）康熙与铎罗的矛盾：捍卫文化自主权

教宗特使铎罗宗主教于1705年4月8日抵达广州，五个月后从广州启程北上。负责在华法国传教会事务的张诚为解决中国礼仪问题，派遣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前去广州拜见铎罗特使。傅圣泽向铎罗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阐释是正确的，向他说明禁止中国礼仪会引发严重后果。铎罗拒绝了法国耶稣会士的建议，要求耶稣会士接受教廷圣职部的通谕，让傅圣泽把他的观点和行动传达给张诚¹。

根据康熙四十四年（1705）满文档案可知，虽然清廷在礼仪上高规格接待铎罗，但仍对其来华目的保持警惕态度：

铎罗既为尔教王之重臣，来京后必将款待、体恤，在此一点无须多言。惟铎罗来华之目的，巡视之规模何也？西洋人来华已有二百余年，不曾闻有如此巡视之事。如今猝来巡视，或因传教士所作所有有异于此前？抑或另有耳闻？铎罗是否传教士，尚不清楚。来京之后，将尔等间之不和、是非，是否判明？若不判明，则其巡视之名虚矣。²

铎罗于1705年12月底正式谒见康熙帝，会见时说明来访目的，解决中国礼仪问题，并试探性地提出是否可以在北京派驻一位教宗的长期代表。康熙帝当时没有拒绝教宗特使的请求，但之后态度发生转变，对铎罗所呈备忘录中译本的看法持否定态度³。

为掌握传教士的数量和行踪，康熙四十五年（1706），清廷晓谕每位在华传教士必须领票传教，要求传教士在“礼仪之争”中必须遵循中国官方的解释方有资格获得信票，获准在华居留的传教士非经皇帝许可，不得返回西洋。

上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教你们回西洋去，朕不教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教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就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⁴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铎罗在1707年1月25日发布通谕谴责中国礼仪，2月颁布了南京训令：所有按照皇帝意志回答颁票前一系列问题的传教士将会面临逐出教会的惩罚，“礼仪之争”的矛盾随之愈发激化。

在宫廷的法国传教士试图调解双方矛盾，但与《尼布楚条约》谈判不同，这次的斡旋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铎罗宗主教的要求和康熙帝的政治、文化观念完全不符。康熙认为外来的罗马教会使者干涉中国礼仪

1 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139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编，安双成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284页。（《赫世亨为是否允准教皇特使铎罗进京事朱批奏折》，康熙四十四年（1705）六月初三。）

3 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139页。

4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四件文书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和清宫事务，而且在京派驻教宗代表是对清帝权威的挑战。教会对中国礼仪的否定冲击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礼仪体系，康熙帝反击的目的是捍卫中国的文化自主权，拒绝罗马天主教会对中国事务的干涉。

（三）宫廷传教士的困境

康熙帝在铎罗来京前已对后者访华的目的怀有戒心，上文提及的赫世亨朱批谕证实了宫廷耶稣会传教士都接到了康熙帝的传召，“即传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等全部前来，当面展示谕旨，逐一解释，晓喻明白”。

法国传教士张诚十分担心天主教在华传播前景，因为如果最高统治者反对天主教，其在华传播进程将大大受阻。铎罗进京前，耶稣会士们向康熙解释特使来华原因，尽可能地化解康熙的疑虑：

以我教之例，除西洋国外，为管理异国之各教会传教士，设一总管人去巡视传教士是否违背教规。若可以治理，务必按照教规进行治理。若难治理，则必驱出。该总管返回之后，将巡视治理情事报闻教皇，并行记录在案。虽有此例，但不曾闻有如铎罗这般重臣赴如中国这般大国巡视。该铎罗原系从小出家修道之人。如今大皇帝恤养我西洋人如同赤子，并为我教再三敕下圣旨，不准禁止传教。又我人员中稍有不和之事，圣虑周详，敦促和睦。因此，西洋人普遍赞叹圣德，不胜感戴无疆殊恩。我西洋人都愿铎罗等重臣前来叩谢皇恩。铎罗仰慕圣主救人之至仁，特带来经过选择之医师，并谢恩之际瞻仰圣颜。¹

康熙朝后期清宫的耶稣会士作为科学人才被皇帝重用，然而整个在华天主教的发展开始转入低谷，康熙帝禁止传教士随意在华居住。虽然耶稣会遵循“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有关“中国礼仪”的看法不同，但在履行传教职责、扩大法国在华传教影响力等方面双方立场一致。作为时任法国传教会在华总会长，张诚于1704年4月25日致信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白日昇，从中可看出他对天主教前景的担忧：

一年来，皇帝已对如此多的欧洲传教士遍布各省表现出不安；徐日昇神父去年从江苏和浙江返回北京的时候，皇帝向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4月4日，他又召见本会视察员闵明我神父、副省会长安多神父和我这位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的总会长到其离宫，并让三位离宫中的官员告诉我们（皇帝身体不适）：（1）为了避免麻烦并使事情变得正常有序，闵明我神父——他视闵明我神父为所有在华传教士的总会长——应该选择一位能为皇帝所赏识的继承人（闵明我神父年老体衰）；（2）在每一座会院，只能有两位来自欧洲不同王国的欧洲人；（3）除了总会长向他提出要求以外，他不会再批准耶稣会士建立任何新的居所。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²

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编，安双成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284—285页。

²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手稿25.057，第459页，转引自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136页。

从张诚1690年至1705年间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通信可以看出张诚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士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¹，而自1693年起就坚决反对“中国礼仪”的严当正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一员。即使对于传教方式存在分歧，耶稣会与外方传教会教士在确保天主教在华传教利益方面始终站在同一立场，与之相对的是，康熙帝对来华西洋传教士的警惕心日益增强。清宫的耶稣会士努力调和康熙帝与教宗特使之间的矛盾，可惜调解失败。张诚在清廷、教宗特使和在华传教士这几方的斡旋中有过维护法国教士和罗马教会的行为，从而失去了康熙皇帝的信任，他去世时康熙皇帝没有任何正式表示²。

除张诚之外，另一位法国传教士薄贤士也曾担当康熙帝与罗马教廷沟通的使者，可惜也以失败告终。薄贤士于1688年受路易十四派遣试图打通中法之间途经俄罗斯的陆路传教线路，可惜事与愿违。薄贤士之后于1699年搭乘一艘英国船抵华，并进入北京宫廷。薄贤士在华旅居时间不长，传教成绩和科研成果均不显著。“礼仪之争”时期，身处宫廷的薄贤士成为清帝和铎罗之间的信使。例如《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进书并报西洋人情形折》有记：

兹除谨呈翰林等所编十四寒七字，二十三篇、薄贤士所撰汉字书三篇外，于初四日，将三阿哥转交克食，由赵昌、赫世亨送与多罗，多罗跪迎祇领讫。³

又如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初六日的《赫世亨进书并报西洋人情形折》：

薄贤士言：我来京城，未为皇上效力，而蒙格外抬举，视为可信之人，委以官差。薄贤士我仰蒙皇恩，感激不尽，虽不能仰报皇恩，但我尽心竭力，将御诏送达等语。言毕叩头。先是，龙安国、薄贤士欲于初七八日起行。至是拟骑骡兼程前往，若本月初十日起程，虽属缓行，亦于十月二十五日内必到，故定彼等初十日起行前往。⁴

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帝派遣薄贤士、龙安国出使罗马，于当年10月份离开北京，次年1月4日离开广州⁵。根据荣振华的《传教士列传》，薄贤士于1708年1月20日由巴西出发后在葡萄牙的海岸遭遇海难逝世⁶。清宫档案方面，两广总督杨琳也在奏折中提及薄贤士的死因：“问在粤西洋人，据称四十五年差往西洋去之龙安国、薄贤士二人于四十六年十二月内将到大西洋，遭风坏船，淹毙。”⁷

法国耶稣会士调停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中西双方文化语境的巨大差别和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其中掺杂着天主教内部矛盾。罗马教会反对中国礼仪一方面源于一神教对其他祭拜仪式的敌对和排

1 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125—138页。

2 博西耶尔夫人著：《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第146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21页。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初四。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62—463页。

5 [法]荣振华等著，耿昇编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6 荣振华的档案来源：收藏于巴黎耶稣会档案的《汉文墓志铭·北京墓地》（*Inscriptions funéraires en chinois, cimetières de Pékin*）。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第一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挤，另一方面是对耶稣会海外传教话语权的打压。

四 结 语

清朝建立之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外关系也随之产生历史性巨变。明初外交的主要对象是与中国有传统交往的东南亚、东亚、南亚、西亚以及印度洋地区的亚非各国¹，到了清代，中国主要面对的是西方各国，迎接的是与中国历代王朝都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外交的开始，虽然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帝国尚未与西方列强发生大规模冲突，但仅有的中外交流和碰撞也凸显出近代外交关系的一些特点，即因文化、宗教、经济模式、国家利益等原因造成了清初中国与外界的摩擦。这种交流与清帝国与其藩属国如朝鲜、琉球等地的关系有着极大的不同。在亚欧大陆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清史中的许多重要史实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已然不再是孤立事件。

在清代康熙时期的中外交流活动中，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起到了沟通的作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国王的数学家”，虽然不是以外交使团的形式，但仍视作17世纪末中法外事交流的重要活动。张诚在清宫为康熙帝服务时，曾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起到翻译和协调的作用。18世纪初，天主教教宗派遣特使铎罗来华，掀起了中西方“礼仪之争”的高潮，皇宫的法国传教士在康熙帝和教宗特使之间斡旋调和，可惜未能取得成功。无论是法国国王派遣“数学家”的动机还是俄国代表在谈判中的咄咄逼人都可以从看出此时的西欧诸国和沙俄都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向外扩张，而中国的宫廷虽然以比较包容的姿态接待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但派遣本国使者出访欧洲的计划较少。康熙向法国派遣的使者是同为法国人的白晋，向罗马教宗派遣的使者，如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等均为西洋传教士，与沙俄谈判需要借助通晓国际法和国家法的徐日昇、张诚作为翻译和助手。可以说，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未具备近代国际外交关系的意识，也缺乏和西方世界建立国际交往的完善机制，基本只能依靠传教士这一途径。中国人自己探索外部世界的愿望显然没有已经开始主导全球化的西欧人那么强烈，这也逐渐演变成今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被动地位。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¹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409页。

